

戴侗《六书故》考论

田耕渔

摘要:戴侗《六书故》一书,在文字学史上是很特殊的一部字典,本文就其对《说文解字》的评价、此书的结构以及此书训义考据之精赅周详、对文字声音的重视、广搜《说文解字》异本等诸方面的特点加以考证和评析,同时也对其缺点如书体、结构、训诂思想各方面都加以评点,以期有助于对《六书故》一书的研究和认识。

关键词:《六书故》;训诂;《说文解字》

中图分类号: H12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11)01-0086-03

宋元之际戴侗所撰《六书故》一书,是对《说文解字》进行变革和改进的一部字典,至少著者戴侗的主观意图是这样。关于此书,引起后人很大的兴趣和争论,如书中采用钟鼎文字书写,不采用部首编排法,全书三十三卷,分为“数”、“天文”、“地理”、“人”、“动物”、“植物”、“工事”、“杂”、“疑”等九部,分为四百七十九个细目,再加上书中对汉字的解释精妙周详的段落常出,故而往往让阅者在惊喜于其精彩的同时,又为其古奥艰涩的文字搔头,对这样一部集才华和迂腐于一体的字典,评者毁誉不一,贬斥者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其“窜乱《说文》,不足取法”,谓其钟鼎文字书式“非今非古,颇碍施行”^①赞誉者如元代虞集认为:“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《六书故》……为近世书法之要论也。”^②然清孙诒让称“其精识独造,实能通究原本,”“明以来缀学之士,如陈第、顾炎武论古音,及近代段玉裁、桂馥、王筠注《说文》、多袭其说”。^③尤其是近代以来推崇者中的唐兰先生,称扬戴侗说:“他对文字的见解,是许慎之后唯一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”,“由宋以来,文字学上的改革,到他是集大成了。他的解释有些地方实超过许慎。”唐兰先生并称《六书故》“纲领清楚,系统完密。”^④由

此可见戴侗与《六书故》不但不是全无是处,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有独到之处的,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。

对于《六书故》的成就和弊端,本文拟从《六书故》对《说文解字》的评价、此书的结构以及此书训义考据之得失、对文字声音的重视、广搜《说文解字》异本等诸方面的特点加以考证和评析,希望能对《六书故》有一个较为清晰和正确的认识。

一、《六书故》对《说文》的评价:

戴侗及其《六书故》,为什么受到历来文字学家及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等书的否定和批评?《六书故》中对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和传统文字观的态度和评价以及《六书故》新的字典结构方式,无疑是问题的主要原因。试读书前的《六书通释》,文中对《说文》是有批评的,如论述《说文》一书的结构时即说:

许氏之为书也,不以众辨异,故其部居淆杂,不以宗统同,故其本离散。^⑤

对于《说文》首创以五百四十部首统领全书文字的结构,予以简单的否定,确是不当的。而说到已著《六书故》的结构,则说:

凡予之为书也,方以类聚,物以群分,以辨其众,父以联子,子以联孙,以统其宗,宗统同,众辨异,故视繁若寡而御万若一,天地万物之富,不可胜穷也,以是书而求之,则若数二三焉。故曰,知治六书者,其知所以治天地万物矣!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经部小学类二》,中华书局,1965年。

②转引自《温州文献丛书·六书故·景印说明》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6年。

③转引自《温州文献丛书·六书故·景印说明》。

④唐兰《古文字学导论》,齐鲁书社,1981年。

收稿日期:2010-11-01

作者简介:田耕渔(1955—),四川雅安人,文学硕士,四川绵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,副教授。

⑤戴侗《六书通释》,《六书故》,永嘉黄氏影抄元刊本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6年。

戴氏得意之情溢于言表，褒己而贬许，言有过其实之处，加以文中更有“六书不必圣人作也”之类的话，故招致千载以来文字学家、正统文字评家的否定和批评，则更不足为奇了。

然而客观地看《六书故》，其书也不无可取之处。也即在《六书通释》之后文里，戴侗对于《说文》又推崇有加，并未简单否定，如说：

外史失官而六书缪乱，楷隶日滋而篆籀湮没。向微许氏《说文》，文字之本，几于景灭而迹绝矣。至於今而犹有考焉者，许氏之功也。

吾先人教学文者，必先六书；学六书者，必考于《说文》。

对于《说文》的局限，亦能从历史的背景来认识：

顾其书牵复于绝学之后，裁成于一人之手，犹未免有遗惧，文字之所不可无者，或见于其注说及他偏旁，盖多有之。徐骑省兄弟不能补正乃曲为之说，殆类杜氏之于左氏，何氏之于公羊氏也。

纵览全书，戴氏每释一字，紧接着必引《说文》之训，可知其书推崇《说文》之厚。所以，历来对《六书故》的批评多有片面之处，未能深察戴氏的训义思想。

二、关于《六书故》的结构和文字书式：

东汉许慎作《说文解字》一书，首创部首编排法，以五百四十部首，统领九千三百五十三字，使纷纭复杂的文字，初步有了门类可归，其五百四十部首及部首之内文字，均“以形系联”，这在字典历史上是一大创举，当然，这一宏大的结构也不无瑕疵，如所谓“以形系联”，其实不能贯穿五百四十部首之形，更不能“系联”九千三百五十三字，只是一个局部存在和宏观的说法，其原由首先在于汉字的形体结构不尽规范，加之许氏未及见到甲骨文等大批出土古文字字形，正是所谓“牵复于绝学之后，裁成于一人之手，犹未免有遗惧。”然而，许氏创立汉字部首之功不可没，这是世界字典史上亦属大发明。

《六书故》的分部，完全打破了《说文解字》的部首和“据形系联”的排列顺序，倒有些像类书的分部方法，检查之际，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找，似乎更加费事，客观地看，许氏部首之法，虽然尚须完善，然而字系于形，更加易于查检，而形义关系也标志了字与字之间的亲属关系。显得更加贴切而合于情理。不过学术发展到宋元之间，思想更加自由宽松，戴侗《六书故》的义类查检法，除了戴氏才智外，也属于时代的产物，假如处在汉代，即

不可能产生。而且这一查检方法，从整体上看，更加具有条理和逻辑，即戴氏所说“视繁若寡而御万若一”、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，不可否认，它启示了后来的辞典编排义类法。

在主张学术自由的今天，客观的评价它，借鉴它，似乎更合宜。

当然，戴氏认为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一书采用小篆是“只求笔势整齐，增损点画，移易位置，使人不知制字之本”^①，于是在《六书故》中，既不用楷体，也不用小篆，而用钟鼎文字，可钟鼎文字并非字字都有，还得以小篆补足，这已是自乱其例。说解文字既用楷书，却又以篆书的笔画来写，难怪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斥为“非今非古，颇碍施行。”这是此书在字体上的缺憾之处。

三、训释考据精详，为《说文》以来字书所无：

《六书故》对文字的注释，不乏考证精详之处，对本义到引申义的用法，解释精到，就此，唐兰先生以为是“许慎以后惟一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。”例如“人”部五“亢”的说解云：

亢，胡郎切。颈当喉处也。象形。（《说文》曰：人颈也。从大省，象形。别作伧、顛、吭、。《说文》曰：伧，人名，引《论语》有陈伧。按陈伧字禽，凡禽者，必先扼其亢也。又扬雄赋：负颡而鸟顛。）颈项直为亢。苦浪切。《传》曰：不能亢身，焉能亢宗。用此义也。因之为高亢。《易》曰：亢龙有悔。《诗》云：高门有亢之类是也。势相敌为亢。（又作伧伧）又古郎切。东方之宿又悬有亢父。

由本义到引申义、借义及文例，周详全面。又如“人”部二“奄”字说解云：

奄，依检切。《书》云：奄有四海。（孔氏曰：同也。）又曰：奄甸万姓。《诗》云：奄有四方。（毛氏曰：大也。）又曰：奄受北国。（毛氏曰：抚也。）又曰：奄有龟冢，遂荒大东。（郑氏曰：奄，复也。荒，奄也。）又曰：奄观艾。（郑氏曰：久也。《说文》曰：复也。大有馀也。又欠也。从大从申，申，展也。按奄有复冒之义，训大训同。训欠非。）又平声，《周官》醢之属用女奚者，皆用奄。（郑氏曰：奄，精气闭藏者，今谓之宦人。《月令》曰：其气闭以奄。）又国名，《书》序曰：成王东伐淮夷，遂践奄。

此训条理清晰，义项全面赅当，如“精气闭藏”一训，深合音义，为明末黄生《字诂》之训资，足

^①戴侗《六书通释》，《六书故》。

可珍贵。

这都是《六书故》独到之处，不应一笔抹煞的。《六书故》于不能归入前七部的字，归入“杂”、“疑”二部。如“王”字归入“疑”部，即因此字不能归入“人”部，也非“天文”部，作者便归入“疑”部，这应该是严谨的。

四、重视文字的声音：

戴氏在《六部通释》中表明他很重视文字的声音，他说：“夫文生于声者也，有声而后形之以文，义与声俱立，非生于文也。”^①他认为“文字之用，莫博于谐声，”研究文字，应该“因声以求义，”下面一段表述，在汉字右文说史上也是最精彩的：

六书推类而用之，其义最精，昏本为日之昏，心目之昏犹日之昏也，或加心与目焉；嫁取者必以昏时，故因谓之昏，或加女焉。熏本为烟火之熏，日之将入，其色亦然，故谓之熏黄，《楚辞》犹作 黄，或加日焉；帛色之赤黑者亦然，故谓之熏，或加糸与衣焉；饮酒者酒酣而上行，亦谓之熏，或加酉焉。夫岂不欲人之易知也哉？然而反使学者昧于本义，故言婚者不知其为用昏时，言日曛者不知其为熏黄，言 帛者不知其为赤黑。它如 疾之 别作 ，则无以知其为危 之疾， 鬼之 别作 ，则无以知其为凶 之鬼。梦戾之戾别作 ，则无以知其由于气之戾塞， 疽之 别作 ，则无以知其由于气之 底。永歌之永别作 ，则无以知其声犹水之衍永。璫粲之粲别作璫，则无以知其声犹米之精粲……

戴氏主张形声字声符表义，而且系统地胪列出来。右文说到了戴侗，可以说是建立起来了，戴侗比宋代王圣美、王观国、张世南都更深入，他以声符的意义为纲，用以解释同声符的形声字的字义，就是指出了初文和孳乳字之间的意义联系，因为形声字声符既能表音，同时其意义又是一组同声符字的“最大公约数性之意义”^②，这是戴侗的创新。当然，正如沈兼士先生的评价：“其弊在略举一二例而不明言其理，迨及请代学者始论及声音训诂相通之理”。^③

五、广搜《说文》异本，以驳正《说文解字》传写之讹误。博引各种文籍，以广训义之视野：

虽然如戴侗在《六书通释》所肯定的，即《说

文》保存了“文字之本”，为“许氏之功”，然而由于《说文》“牵复于绝学之后，裁成于一人之手，犹未免有遗惧”，这“遗惧”一部分就是“不可无”之字无之、“一字再现，遗逸重复”这些错讹之处，这或许是许慎留下的，亦或许是汉以来历代传本留下的，所以，戴氏在考证文字时，广搜《说文》异本，有唐本、蜀本、徐本、李阳冰广《说文》本等。据笔者考证统计，《六书故》一书引用异本《说文解字》材料共有118条，其中：唐本《说文解字》55条^④、徐本《说文解字》32条、蜀本《说文解字》11条、一本《说文解字》2条、李阳冰广《说文解字》18条，（具体内容笔者将以另文刊出）。如“地理”部一“锷”字的说解云：

锷，诘结切，《说文》曰：“鎌也。”按锷：

薄之义，或取诸此。（蜀本《说文》曰：刎鎌也。

又曰：小鎌，南方用以义穀。）

今存大徐本《说文》：“鎌也。从金，契声。苦结切。”可见蜀本与今本差异很大，此可备一说。又如“动物”部二“龙”下云：

龙，力钟切。鳞虫之长，渊居而天行。（唐

本《说文》：从肉从飞及童省。）

今大徐本：“龙，鳞虫之长，能幽能明，能细能巨，能短能长。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潜渊。从肉飞之形。童省声。”各本差异很大，字形之解应以唐本为佳。

“动物”部三“佳”字说解云：

佳，职惟切，又子回都回二切。短尾鸟也。

今俗以短后为佳。《诗》云：“翩翩者騅。”（徐

本《说文》：騅，祝鸠也。佳声。）

按今大徐本《说文》“祝鸠也。从鸟佳声。思允切”。由各种版本可见，《说文》在传写中，异训之多，而此字之解，以大徐本《说文》“祝鸠也。从鸟佳声。思允切”为佳。

从此还可看到，《六书故》几乎每字解后都引《说文》之解说，可见其推崇《说文》之厚。除此之外，据笔者统计，此书广征博引各家各书之说，材料十分丰富，共近一百家，古典群籍共八十余种，这比《说文》引“六艺群书四十余种，博问通人三十九家，”可以说是更加丰富广博了。

（下转第27页）

①戴侗《六书通释》，《六书故》。

②沈兼士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

③沈兼士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》。

④据笔者考证统计，《六书故》引唐本《说文解字》材料共55条，较党怀兴统计多二条，即“龙”、“莖”二条，（详见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1999年第4期党怀兴文《〈六书故〉所引唐本〈说文解字〉考》）。

水芙蓉，与波明灭，至秋高水落。亭亭孤峙，不可攀跻。予尝泊舟其下，明月东来，江水莹白，独坐览史，觉草木皆有香，始知古人命名，殊不草草。此山正对潇水上流，为江华道州木筏所必经，每春夏盛涨水溢，误触之，辄木漂人溺。同治癸酉，署零陵令徐保龄，偕邑人士，设救生船，建观音阁，命僧主持，水涨时，昼钟夜灯，使人知警，可谓盛德事。”按：《张修府日记》香零山记载比清曾国荃《（光绪）湖南通志》卷18《地理志》关于香零山记载多出约二百字，更为详尽生动。张修府能诗文，文笔极佳，随其游踪，详细记载各地风情，为方志提供了更为丰富翔实的资料。

又如书院情况记载：同治六年十月十二日“……刘观察达善筹存公款三千金，详定每年六课（每课

阅卷修金二十两，奖赏四十两，共三百六十两，余先零用。）颇称盛举，此课则廉访命题也。”按：此则日记可考书院经济来源，阅卷修金等情况。日记中较大篇幅记载了科举考试从命题到阅卷的过程，并详录其试题等。特别是记载了岳麓书院、城南书院、濂溪书院等详细情况，对于书院研究可说是第一手资料。

总之，《张修府日记》大量篇幅涉及到疆域、城池、坊巷、风俗、山水、水利、行署（衙门、任职人员等、祠堂）、学校（书院）、乡都村镇、寺观、津梁、坛庙祠宇、第宅园林、名宦、人物、艺术、释道、金石、祥异、杂记等等，俱可补湖南各地方志之史料，价值颇高。

（责任编辑：黄云鹤）

（上接第88页）

《六书故》所存《说文解字》各种异本的资料，是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，可以补今本之不足，可以管窥《说文》的原貌。其中之唐本资料应是很丰富的了。除此之外，今所见唐本，仅有唐写本《说文》两种残本，一为木部残本，一为口部残本。木部残本仅有六纸共188字，为清代莫友芝得之于安徽黟县令张仁法者；口部残本有二：一为日本人平子尚氏所藏，存四字，未公诸世。一为日本人某氏所藏，仅6行12字，见于日本《京都东方学报》第10册第一分册《说文展观余录》，为唐代日本人摹本^①，此二种残本，深受《说文》研究者珍视，由此可见《六书故》所存异本资料之珍贵。

《六书故》之后，元明二代产生了一批效仿戴氏此书的字书，如元扬桓的《六书统》、《六书溯源》，和元周伯琦的《说文字原》、《六书正讹》等等，其意在变革改进《说文》，也是糟粕与精华并存，但对清代研究《说文》影响很大，是不争的事实。

结 语

以上，本文对《六书故》一书作了一个肤浅的综论，以期能有助促进对这一部古代字典的研究，错误之处，想必难免，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。

（责任编辑：石磊）

^①周祖谟《问学集·唐本〈说文〉与〈说文〉旧音》，中华书局，1966年。